

从上博简《武王践阼》看两周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变迁

邓国军

摘要: 空间既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亦是探究人类社会秩序及其演进的基本视域。“君王南面”礼制是两周统治者基于建筑空间所建构的一种君臣身份秩序,它在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中起着总体导向性作用。“君王南面”礼制在两周时期展现出了沿袭与变革的双重面向,其中变革表现为:一是“下移”,即“南面”的主体由君王向下扩大到霸主、强者、臣僚,“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泛化;二是“上移”,即随着造圣运动的兴起,东周时人将“南面”的权力赋予“圣王”,形成了“圣王南面治天下”的理念,“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理论化。至战国中晚期,礼学家、思想家们结合社会现实,以托古的方式,建构起了制约王权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垄断,上博简《武王践阼》中武王“东面”“北面”正是其典型表现。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历时性变迁从微观层面揭示了“空间”在周代政治秩序建构中的价值,由此可建立起“空间方位—权力关系—身份秩序”的分析路径,以此来管窥“空间”在早期中国政治秩序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上博简;君王南面;《武王践阼》;两周君臣身份秩序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1-0129-08

空间既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亦是探究人类社会秩序及其演进的基本视域。随着周代社会阶层的细化,周人贵族强化了对于生存空间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划界,在朝觐、祭祀、册命等礼仪活动中利用空间方位来区分君臣、主宾乃至生死的身分等级秩序,空间方位因此成为了凸显王权、区分贵族身份的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行手段^[1]。西周早期宜侯矢簋铭文云:“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延省东国图,王卜于宜,入社,南向。”^{[2]2695}西周中期走马休盘铭文又云:“唯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在周康宫。旦,王各大室,即位,益公佑走马休,入门,立中廷,北向。”^{[2]5475}上揭材料表明西周早中期周人已在南北方位与君臣关系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君王南向”“臣属北向”成为了君臣尊卑秩序的重要标识。

然而,上博简《武王践阼》记载了周武王两次向太公望问道之事,其中所涉朝堂礼仪中君臣面位皆非“君王南面”。武王第一次所问为“黄帝、颛顼、尧、舜之道”,其文云:

武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黄帝、颛顼、尧、舜之道在乎?意微丧不可得而睹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如欲观之,盍斋乎?将以书见。”武王斋三日,端服、冕,踰堂微,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夫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西面而行,曲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奉书,道书之言。^{[3]151-153}

简文中武王本欲南面而问道,师尚父明言“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由“南面而立”改为了“东面而立”。武王第二次向太公所问为“不盈于十言,而百世不失之道”,其文云:

收稿日期:2024-10-23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方位观念与商周社会秩序”(20CZS012)。

作者简介:邓国军,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导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心研究员(湖南长沙 410082)。

武王问于太公曰：“亦有不盈于十言，而百世不失之道，有之乎？”太公望答曰：“有。”武王曰：“其道可得以闻乎？”太公望答曰：“身则君之臣，道则圣人之道。君斋将道之，君不斋，则弗道。”武王斋七日，太公望奉丹书以朝。太公南面，武王北面复问。太公答曰：“丹书之书有之曰：‘志胜欲则利，欲胜志则丧。’”^{[3]162-164}

此次朝堂问道，太公南面，武王北面。上博简《武王践阼》为战国前中期楚地流传文献，其内容未必为西周史事之实录，但其所载武王“东面”“北面”问道与“君王南面”礼制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张力，这提示我们一方面应当重新反思“君王南面”礼制在周代的适用范围，周代统治者利用空间建构君臣身份秩序的具体面向及背后逻辑；另一方面也要对上博简《武王践阼》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时代性进行客观审查、合理批判。过去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君王南面”礼制在周代君臣身份秩序表达中的作用^①，但尚未将“君王南面”礼制与“君王北面”“君王东面”“臣僚南面”等内容纳入到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这一整体框架下予以讨论。事实上，这些问题恰恰是理解中国早期王权的运作形态、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析与诠释，不仅有助于揭橥两周王权、空间与君臣身份秩序之间互动的复杂面向，还有助于探究空间方位在中国古代权力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

一、君王“南面”：西周王朝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核心形式

在西周整个权力系统中，王权起着主导和枢纽的作用。为了实现对邦内诸侯、臣僚及民众进行有效统治，周王具体通过分封、巡狩、册命、聘享、征伐等方式使其权力加以运行。王权的实际运行需要依赖一定的空间，因为空间不仅是王权运行的载体，同时也为王权运行提供了场域。循此思路，我们通过西周文献所载王权运行的具体形式，便可清楚地获悉王权运行的空间场所。

西周王朝凡继承王位、分封诸侯、任命官职、赏赐臣下，都要举行隆重的册命礼。就现有史料而言，册命礼最早见于西周中期铜器铭文，这些铭文中载有册命活动举行的具体场所。西周中期七年趯曹鼎铭文载：“唯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宫。旦，王各大室，邢伯入佑趯曹，立中廷，北向。”^{[2]1450} 铭文

明言周王举行册命之所为周般宫大室。逢祭祀、出征凯旋、封建诸侯、大射前后，周王往往要宴飨诸侯群臣。周王宴飨活动在西周金文中通常表述为“王飨礼”“王飨酒”或单作“飨”。西周中期效卣铭文亦载：“唯四月初吉甲午，王观于尝公东宫，纳飨于王，王赐公贝五十朋。”^{[2]3414} 铭文表明举行飨礼的地方为尝公东宫。此外，周代王权运行还体现在朝聘活动中，西周中晚期应侯见公钟铭文云：“唯正二月初吉，王归自成周，应侯见工馈王于周，辛未，王各于康，荣伯入佑应侯见工。”^{[2]100} 此处“康”疑为“康宫”，应侯在成周为周王举行了馈问活动，周王在康宫召见了应侯。上揭史料表明，无论是册命、宴飨或是朝聘活动的开展，均离不开宫、庙、大室等礼制建筑空间。这些礼制建筑空间构成了王权运作的主要场域，周王在这些场域中通过册命、宴享、朝聘等形式，使其权力得以顺利运行，进而确立了王权的独尊以及对臣权的统属。

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在构成王权运行场域的同时，这些建筑空间的位置、方向、尺度、高度等内容也体现着权力的差异，影响和制约着王权的运行，其中空间方位对于周代王权运作的影响尤为明显。《周礼·天官·叙官》开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4]1373-1374} “辨方正位”，贾公彦疏曰：“谓建国之时，辨别也。先须视日影以别东西南北四方，使有分别也。正位者，谓四方既有分别，又于中正宫室朝廷之位，使得正也。”^{[4]1374} 周代统治者在建国营都过程中，通过辨正方位的手段，将建筑空间秩序与政治权力秩序、君臣身份秩序巧妙对应起来，并以宫殿、宗庙、朝堂等建筑的形式使之视觉化，从而使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方位布局成为标识君臣身份秩序、彰显王权独尊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

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方位布局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整体走向，二是宫、庙、朝、寝等建筑空间内部的方位布局。显然，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受到前者的影响和规制。有关周代宫、庙、大室等建筑空间的整体方位布局，具体通过考古发掘的西周遗址可窥见一斑。目前已发掘的西周宫、庙、大室等礼制建筑基址主要分布于周原地区、丰镐地区。其中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夯土基址平面呈长方形，整个建筑坐北朝南，方向北偏西 10° ^[5]。从基址出土的陶器来判断，其始建年代约在武王灭商前，废弃年代当在西周晚期。关于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性质，有周王行宫、宫

室建筑或贵族宅院诸说^[6]。丰镐地区在沔东的斗门镇、官庄村和花楼子等地已发现 10 余处夯土建筑基址,其中五号夯土基址整体呈“工”字形,主体建筑为坐北朝南。发掘者认为该建筑始建于西周早期,延续至西周晚期,根据其规模及营建方式,推测应是一座重檐式的天子宫寝建筑^[7]。以上考古材料表明,西周时期的宫、庙等建筑大多采取坐北面南的布局。周人之所以选择“坐北面南”的建筑取向,固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即坐北面南不仅有利于采光,还可以避开冬季寒冷的西北风,同时它也与当时的礼制密切相关。因为,宫殿、朝堂等建筑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居民建筑,而是周王施政布政之所。这些大型宫殿建筑的基本功能在周代已然超越了普通“遮蔽物”范畴,被周人赋予了更多的礼制内涵,成为周代宗法礼制、权力秩序的重要载体。与此相应的,这些宫殿建筑所遵循的方位布局原则上成为体现周代礼制精神及权力秩序的重要途径,直接影响着权力主体在建筑中的空间站位及其行为活动,这在西周册命礼仪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册命礼仪中,周王位于廷北,南面,受命者由傧引入,立于中廷,北向。周王授册命之文书给史官,史官位于周王的右侧,南面宣读文书。在中廷中,周王占据尊位,立北面南,臣子则立南面北接受册命。

在坐北面南的宫庙、朝堂等建筑空间中,君王立北面南发布册命、训诫、赏赐,臣属立南向北接受任命、训诫、封赏,久而久之,君臣之间的南北方位逐渐固化为君臣身份秩序的重要标识。西周晚期晋侯苏钟铭文:“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向。”^[8],此处并不涉及宫庙、朝堂等传统的权力空间,但铭文特意交代了周王巡视晋师下车后所立方位为立北面南,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君王南面原则在王权的反复实践中已经脱离了具体的施政场所,被抽象成了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条准则。“君王南面”原则也因其鲜明的政治性,被周人赋予了礼制内涵,成为周王朝秩序之必要构成部分,并以“礼制”的形式形成传统,成为周王经营自己位置的手段。

综上,“君王南面”礼制是基于建筑空间中君王与臣属之间空间站位以及尊卑等级关系而建立的一种君臣身份秩序的空间表达形式,严格规范着周王朝君臣身份秩序。君王处于权力空间体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地位,在权力空间中臣属的位置均围绕君王而展开。“君王南面”礼制在周代君臣身份秩序建构中起着总体导向性和根本制约性的作用,周代统治者通过与建筑空间同构的形式,在空间方

位体系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对应关系,为保证君王所处位置的排他性与独尊性,他们在遵循“君王南面”前提下,又通过“中心—边缘”“内外”“上中下”“左中右”等方位体系对君臣身份秩序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化。

二、“君王南面”礼制的沿革与东周政治秩序的维系

“君王南面”礼制在东周时期展现出了“传承”与“变革”的双重面向。其中“传承”主要表现为东周时人承袭西周形成的“君王南面”礼制传统,十分强调君王与臣属在权力空间中的空间站位及权力关系。大致成书于春秋时期的《仪礼·士相见礼》云:“凡燕见于君,必辩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4]2108}意即臣僚在闲暇时见国君,也要遵循“君王”南面的空间礼制,不能因为国君不是面朝南,臣僚就可以斜向国君。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夏官·司马》更是云:“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等。王南乡,三公北面,东上。”^{[4]1833}引文中的“南乡”即为“南向”,“正朝仪之位”就是让君王南面而立,三公北面称臣,“辨其贵贱之等”指尊者处尊位,卑者处卑位。上揭史料中“君王南面”与“臣属北面”对举,“南面”“北面”二者相互依存,共同表征着君臣身份秩序,这也揭示了“君王南面”礼制依然是春秋战国君臣共同遵守的一条准则,严格规范着东周政治秩序。此外,“君王南面”礼制有时会省略权力运作的具体空间以及空间中的君臣站位,直言“君王南面”“南面而霸天下”“南面而君天下”“南面行王事”,所强调的是“南面”的权力象征意涵,即认为“南面”成为王天下的一个重要条件。君王治天下必先南面,南面实际上成为取得王位行使王权的象征或者代名词。

“君王南面”礼制在东周沿袭的同时亦在变革,其中变革路径可概括为两条:一条是“下移”路径,一条是“上移”路径。其中“下移”路径主要表现为东周时人将“南面”的主体由君王向下扩大到霸主、强者、臣僚甚至丧主,形成了“霸主南面”“嫡子南面”等理念,致使“君王南面”礼制走向了泛化。“上移”路径主要表现便是东周时人将“南面”的权力赋予了“圣王”,形成了“圣王南面治天下”等理念,“君王南面”礼制由此走向了理论化。

首先来看“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泛化与东周政治秩序的维系。“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主要是

针对“南面”主体身份等级而言的,即时至春秋乃至战国时期,作为表征君王身份秩序的“君王南面”礼制出现了僭越与泛化的现象。其中“僭越”表现为“臣子干君位”和“诸侯僭天子之位”。“臣子干君位”的典型例子是春秋时期的“魏子干位以令大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魏子南面。卫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9]魏子南面,以卿的身份居君位,在卫彪傒看来这是比不敬“天”还严重的事情。“诸侯僭天子之位”典型例证是“齐闵王欲南面吊唁邹国国君”,《战国策·赵策》载:“将之薛,假涂于邹。当是时,邹君死,闵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10]¹⁰⁴⁰齐闵王僭越行天子之礼,欲南面吊唁邹国国君,遭到了邹国群臣激烈的反对。

与“僭越”现象并存的是“君王南面”礼制的泛化,具体表现为:“强者南面”与“嫡子南面”。“强者南面”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其文云:“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11]此处“鲁后世其北面事齐”所涉及的权力主体为鲁国与齐国,已经超出了普通君臣的范畴,意思是鲁国后世将成为齐国附属,显然是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附君臣关系。“嫡子南面”见于《礼记·檀公上》,卫国的贵族司寇惠子去世,家中举行丧礼,但家里并没有按照礼的要求,让其嫡子虎作为继承人来做丧主,而是惠子之兄文子做起丧主。孔子的弟子子游通过一系列违礼的吊丧行为让文子意识到丧礼的不妥之处,随即“扶适(嫡)子南面而立”。此处“嫡子南面而立”涉及的是“丧主”与“丧客”的空间站位,并不涉及君臣关系。显然此处东周时人基于家国同构的理念,将国家政治权力空间中的“君王南面”泛化为家庭权力空间中的“嫡子南面”。

此外,“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在《论语·雍也》中“雍也可使南面”体现得最为典型,孔子以“南面”代指君位,认为其弟子冉雍的能力足可胜任一诸侯国之国君。

再来看“君王南面”礼制的上移与“圣人南面治天下”观念的出现。“圣人南面治天下”观念的出现不仅与“君王南面”礼制的下移、泛化密切相关,同

时也与东周时期“造圣运动”的兴起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圣”字由原始含义向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转变^[12],“诸子将圣人与道、天、地加以连系,使圣之古义大为扩大延伸。从此,圣人乃能明乎道,通乎天地,不仅是一般的睿智通明了”^[13]。该时期的思想家们不仅将理想化的先王纳入了圣人谱系,还将有德行的贤者塑造为圣人,“造圣运动”逐渐兴起。刘泽华先生曾指出:“由先秦诸子所发起、在百家争鸣中充分展开的‘造圣’运动,建构了一个以圣化为中心的政治思维普遍范式。”在这一政治思维范式中,“圣人成为政治思维过程中的最高范畴和最终的决定力量”^[14]。随着王权凌夷,“君王南面”礼制不断地下移与泛化,春秋战国思想家们为了重建失序的王制秩序,遂在“南面”的权力主体中还加入了尧、舜、禹等上古圣人,以此作为现实“君王南面”合法性的更高层次的依据和指归。“君王南面而治天下”相应地也表述为“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圣人南面而治天下”。《礼记·大传》云:“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15]³²⁶⁵其中南面的主体已然由“君”变为“圣人”。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又云:“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16]“南面而王天下”的主体便是圣人尧、舜。上揭材料共同表明,周人利用南北方位标识君臣身份秩序的传统,在战国时期已被抽象成了“圣人南面而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综上,时至东周,虽然王权式微、礼崩乐坏,但是“君王南面”礼制在传承与变革中已成为政治思维前提性和社会整体控制性的普遍观念,在东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广泛的作用。无论是“君王南面”礼制的“上移”还是“下移”,它都严格规范着君臣之间的身份尊卑秩序,以至于时人将君王的政治统治之术称之为“君人南面之术”^[17]。

三、战国中晚期制约王权理论的兴起与“君王”面位的多元化

“君王南面”礼制成为周代重要的统治理念并为时人所熟知和尊崇,这是否就意味着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完全垄断或独占呢?西周时期王权神授,天子独尊,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和最高权力的象征,周王独享权力空间的尊位,自然是可能的。但是春秋已降,周天子权力式微,诸侯、卿大夫崛起,周天子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这种挑战和质疑在思想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制约王权独尊理论的出

现,如尊先王理论,人们打着尊先王的旗号,来批判现实的君主。再如权势与道义二元化理论,儒家力求道与王的统一,在道与王发生矛盾时,主张从道不从君。道家在认识上把君主和道分为二元,崇尚道高于君^[18]。这些理论的出现表明在东周权力空间中出现了一些制约和抗衡王权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师、道、祖权与神权。出于尊师、重道、敬祖、重神等原因,当君王与师、尸抑或代表神意志的卜筮之官共处同一权力空间时,君王有时就要让渡出“南面”之权,需“东面”甚至“北面”,这从东周文献中可窥见一斑。

首先,来看师无“北面”之礼。《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15]3302}其中“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意即因为尊师的缘故,当臣为王师时,无须遵守“北面”之礼。师无“北面”之礼亦见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武王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颡顛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19]《武王践阼》又见于上博简,所述事情大致相同,就其反映的礼制来看,武王改君臣之礼为师徒之礼,立西面东,尚父立东面西,授之先王之书。武王面位的转变,虽有“尊师”的考量,但更多是受“重道”观念的约束。此外,《吕氏春秋·下贤》又云:“尧不以帝见善卷,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卷,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卷,道得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20]引文中尧向得道之士善卷问政时“北面”,也完全是基于“重道”的考量。由于尊师、重道的缘故,逢师或得道之人,君王处于卑位,对应到南北方位上,则是君王“北面”,师或“得道”之人“南面”。这与“君王南面”礼制传统明显不同,其背后反映的是以“师”为代表的师权或以“得道”之人代表的“道”对于王权的制约。

其次,来看尸无“北面”之礼。所谓“尸”,指宗庙祭礼中用于代替祖先神灵的活人。《公羊传》宣公八年云:“祭之明日。”何休注曰:“祭必有尸者,节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21]《礼记·曾子问》云:“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15]3030}尸在宗庙中的地位最为尊贵,无

论主祭者为君或为父都得恭敬服事。《礼记·学记》记载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其中之一便是当其为尸,则弗臣也。意为当臣属充当“尸”的角色时,君就不能使“尸”来行臣礼,亦即“尸”无北面之礼。《礼记·祭统》云:“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所使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15]3483}孙希旦集解曰:“此据祭考庙而言之,故尸于主祭者为子行,主祭者于尸为诸父也。北面而事之者,天子、诸侯之礼,朝践时尸在堂上南面,主人北面而事之也。”^{[15]1244}引文及相关注释表明《祭统》的作者已将君臣关系与尸主关系联系在一起,并利用宗法传统和祭祀仪节,将“尸”的地位置于现实君王之上。在事尸之礼中,相对于“尸”而言,现实的君王地位较卑,故处于卑位,遵循的是“北面”之礼。尸无“北面”之礼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在周代权力空间中,“南面”并非君王的特权,当君王面对地位较高的以“尸”为代表的祖权时,就只能屈居卑位,以“北面”来行事尸之礼。

最后,来看神无“北面”之礼。《礼记·祭义》云:“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孔疏云:“立以为《易》者圣人,谓伏羲、文王之属与建阴阳天地之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阴阳以作《易》,即今时《易》也。‘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者,立为占《易》之官抱龟南面,尊其神明故南面,天子执卑道,服袞冕北面。”^{[15]3474}孙希旦云:“易抱龟南面,此‘易’谓卜、筮之官也。”“此卜者南面,天子北面,盖卜郊之礼。”“天子让善于天,因举卜、筮一事,以见圣人之尊天,又因圣人之尊天,而言圣人之尊贤,皆所以教天下以谦让之德也。”^[22]由引文及诸家注疏可知《祭义》的作者圣人、天、《易》与卜筮之官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卜筮之官与天子由君臣关系演变为人神关系。在周人观念中,天的权威要高于天子,因此在权力空间中代表天意志的卜筮之官要立于尊位,即“面南”;而王权的所有者——天子则处于卑位,要“北面”,这揭示了当卜筮之官充当“神”或“天”的角色时,亦无须行“北面”之礼。“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表明在周代权力空间中君王并非始终处于尊位,逢地位尊贵的“天”时,君王会处于卑位——立南面北,而代表“天”神的卜筮之官则处于尊位——立北面南。

综上,上述记载君王“北面”的文本主要包括《礼记》、《大戴礼记》、上博简《武王践阼》、《吕氏春

秋》,这些文本的成书时间都不早于战国前期,但其所记内容或多或少带有战国以前的史影。由于史料阙如,尚不能深究上揭材料所载“君王北面”在东周时期到底多大程度上实行过,但君臣之间的空间站位明显地传递出文本编辑者的基本意图。单就文本所反映的编者意图来看,“君王南面”礼制虽成了周代重要的统治理念,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王权会受到师、道、祖权、神权的制约,这与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出现的制约王权独尊理论是相契合的。战国时期的礼学家和思想家们在以当时可以想见的场景来描绘古史,或以古史人物说理的过程中,建构起来“先王之书,不可北面”“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等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垄断,即在宗庙、朝堂等权力空间中,君王并非始终处于尊位,逢尊师、重道、祭尸、敬神时君王也会处于卑位。这也揭示了“君王南面”礼制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准则,而有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战国时期“君王南面”礼制仅适用于君臣关系,当君臣关系转化为师徒关系、尸主关系、人神关系时,“君王南面”礼制就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南面”也不再是君王身份的标志。

四、基于制约王权理论重申上博简《武王践阼》中君王面向的历史建构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4]¹³⁷³⁻¹³⁷⁴表明周代统治者素来重视空间方位在周代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建构中的作用,空间方位因此也成为周代社会秩序、政治秩序重要的表达形式。君臣身份秩序作为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核心内容,它的具体呈现和表达无疑离不开空间方位。“君王南面”礼制正是统治者利用空间方位来经营自己位置的具体实践。不过,以上博简《武王践阼》为代表的东周文献所载君王“东面”“北面”乃至臣僚“南面”皆与“君王南面”礼制存在着明显张力。这不仅揭示了战国时期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多重面向,客观上也展示了空间、权力与君臣身份秩序之间的多元互动,具体为,王权的运作依赖于权力空间并通过权力空间来开展。周代王权运作的空间主要有宫、庙、大室等礼制建筑,这些礼制空间不仅为王权运作提供了具体的场域,同时它们所遵循的方位布局原则也深刻地影响着权力主体的空间站位及其行为活动,并且成为表征周代君臣身份等级尊卑秩序的重要准则。在表征权力主体尊卑秩序的过程中,空间方位与权力主体的身

份等级之间建立起了对应关系,并被权力主体赋予尊卑属性,甚至某些方位固化为部分权力主体的代名词。在坐北面南的宫庙、朝堂等建筑空间中,君臣之间的南北面位逐渐固化为君臣身份秩序的重要标识,“南面”代指君王,“北面”表征臣属。“君王南面”礼制的生成过程揭示了南北空间方位的尊卑属性与君王身份等级秩序构成了一种互动共生关系。

君王“东面”“北面”与“君王南面”礼制之间张力的存在揭示了周人利用空间方位建构身份秩序的复杂性,“君王南面”本质上是“尊者南面”。当空间方位固化为礼制时,其尊卑属性也就基本定型,空间方位的尊卑属性脱离了权力主体身份,可以独立地表征君臣、师徒、人神等不同权力主体的身份秩序。具体就南北方位而言,当南面为尊、北面为卑固定以后,南面的权力主体就由“君王”演变为“尊者”,“君王南面”就转变为“尊者南面”。也就是说,当君王为尊者时,其便可南面;当逢尊师、重道、敬祖时,君王便须北面。以上信息表明空间方位的尊卑属性具有绝对性,权力主体的尊卑关系则表现出相对的特征。

“君王”南面与臣属“南面”在同一权力空间中是可以共存的,不过,在同一空间中尊位是唯一的、绝对的,即君王与臣属同为“南面”并不意味着君王与臣属共享同一个尊位。当君王与臣属共同“南面”时,周人就会通过诸如内与外、中心与边缘、上与下、左与右等其他方位系统来区别或表征君臣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确保君王独享权力空间中的尊位。这客观上也揭示了在同一权力空间中,当权力主体人数较多时,权力空间中的尊位并不是由单一方位系统(即四正系统)来界定的,而是由不同的方位系统共同界定的。易言之,南面与北面仅是周人所构建的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回过头再来分析本文开头所引的上博简《武王践阼》中的君王面向,武王第一次问“黄帝、颛顼、尧、舜之道”,本欲南面而问道,师尚父明言“先王之书不与北面”,武王由南面而立改为了东面而立。武王第二次问“不盈于十言,而百世不失之道”,太公望答曰“身则君之臣,道则圣人之道”,太公南面,武王北面复问。虽然两次问道所处的空间皆是朝堂,武王与师尚父的现实身份也均为君臣关系,但是由于“先王之书”“圣人之道”象征着更高的权威,凌驾于现实的君权之上,现实的武王需要将朝堂空间中的尊位让渡给“先王之书”“圣人

之道”的掌握者师尚父。上博简《武王践阼》所记载的君臣面位随着权力关系转变而作的调试正是战国时期空间、权力与君臣身份秩序多元互动的一个缩影。

叙述到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以上博简为代表的东周文献中所记载的君王“东面”或“北面”,到底仅仅是一种历史建构,还是有其史实之素地?从上揭文献记载来看,君王“东面”或“北面”出现的文本多为战国时人的托古之作。上博简《武王践阼》为战国前中期楚地流传的文本,其所载周初武王践阼的具体场景,绝非西周历史之实录。不过,揆诸事理以及战国时期其他文献,上博简《武王践阼》所载的君王“北面”或“东面”问道的情形与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历史有诸多相合之处。《战国策·燕策》云:“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10]¹⁵⁵²意即身份尊贵的帝者、王者、霸者以及亡国之君,屈尊北面问学,应是战国时期君主招揽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综上可知,以上博简《武王践阼》为代表的东周文献中所载君王“东面”或“北面”既是一种历史建构,也有史实之素地。战国时期的礼学家、思想家,通过托古的方式,将战国时期“北面受学”“西向对而师之”等内容与周初武王践阼等事实叠合在一起,以此来宣扬自己尊师重道之主张。如果以上判断不谬的话,那么我们由东周时期权力空间中君臣空间位置关系的多重面向可知,空间方位在表征君臣身份秩序的过程中具有了尊卑属性,形成了权力空间中的“尊位”。权力空间中“尊位”一旦形成,便独立于其所附属的君臣身份秩序,固化为尊者处“尊位”的局面,即“尊位”并非为君王所独占,当君王在权力空间中非最尊者时,便不可居“尊位”。

结 语

空间方位既关联中国早期王权的运作形态,亦牵涉君臣身份秩序的表达。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关系外在化、空间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空间方位被赋予权力和秩序诸种语义的过程。周代统治者通过与建筑空间同构的形式,在空间方位体系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建立起了复杂对应关系。君王处于整个建筑空间体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地位,为保证君王所处位置的排他性与

独尊性,两周统治者一方面基于宫、庙等建筑空间方位建构了“君王南面”的君臣身份秩序,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心—边缘”“内外”“上中下”“左中右”等方位体系对君臣身份秩序做了更进一步细化。不过,春秋以降,随着周天子权力式微,诸侯、卿大夫崛起,王权的独尊地位受到了挑战和质疑。东周时期礼学家、思想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托古的方式,建构起了“先王之书,不可北面”“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等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君王对权力空间尊位的垄断,出现了君王“东面”甚至“北面”的情形。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的历时性变迁无疑构成了两周礼制变迁的一个缩影。在家国同构的周代社会中,君臣身份秩序在社会秩序建构中无疑起着统括作用。对周代君臣身份秩序空间表达多重面向的揭橥,不仅有助于厘清周代君臣身份秩序建构所遵循的权力逻辑,还可以建立起“空间方位—权力关系—身份秩序”的分析路径,以此来考察周代夫妇、宾主、师徒、人神等不同社会身份秩序的空间表达,进而管窥空间方位在整个早期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作用。

要之,“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空间礼制在两周社会领域里的具体实践,不仅展现了周代权力运作的空间法则,亦为学界认识两周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提供了一种崭新且富有穿透力的视角,这也揭示了“空间”之于两周社会史、政治史意义重大,必将成为当前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大有文章可作。

注释

①“君王南面”礼制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共同关注的命题。考古学者主要是基于考古材料来考察周代宫庙建筑的朝向布局问题,代表性成果有曲英杰:《先秦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蔡运章、愈凉巨:《西周成周城的结构布局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6年第1期,等等。历史学者主要是基于西周册命金文材料来考察册命朝议中君臣的空间站位问题,如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的部分章节均有专门的讨论。

参考文献

- [1] 邓国军.空间方位观念与商周王朝秩序[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1-73.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3]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4] 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5] 陕西周原考古队.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79(10): 27-37.
- [6] 井中伟, 王立新. 夏商周考古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213.
- [7] 周原考古队. 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 1999-2000 年度发掘简报[J]. 考古, 2002(9): 3-26.
- [8] 钟柏生, 陈昭容, 黄铭崇, 等. 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M]. 台北: 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2006: 642.
- [9]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518.
- [10] 诸祖耿. 战国策集注汇考: 增补本[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 [1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524.
- [12] 王文亮. 中国圣人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7.
- [13] 邢义田. 天下一家: 皇帝、官僚与社会[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51.
- [14] 刘泽华.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2.
- [15] 阮元. 十三经注疏: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6]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58.
- [17]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732.
- [18]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史: 先秦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 109-110.
- [19]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03-104.
- [20]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370.
- [21] 阮元. 十三经注疏: 第5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952.
- [22]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1234.

Discussing the Spatial Expression of the Order of Monarchs and Ministers in the Zhou Dynasty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Wu Wang Jianzuo*

Deng Guojun

Abstract: Space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constituents of human society, and also a basic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order of human society and its evolution. The ritual order captured in the aphorism “the ruler faces south” was a ruler-subject identity order established by Zhou rulers, which was based on architectural space. It played an overall guiding role in the spacial expression of Zhou rulers-subjects identity order. It was a spatial expression of the overall directionality of the status dynamics between Zhou period rulers and their subjects. During Zhou period, “the ruler faces south” ritual order developed aspects of both continuity and change. With respect to change: firstly, there was a “downward shift”, namely, a downward shift in the status of those who could “face south” from monarchs alone to eventually encompass various hegemony, strongmen, and bureaucrats, and there was a dilution of “ruler faces south” ritual order; secondly, there was an “upward shift”, namely, with the inception of a movement of “sage-creation”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the prerogative to “face south” was also bestowed upon “sage-kings”, thus there developed the idea that “the sage-king faces south”, and as such there was a theorization of the “ruler faces south” ritual order. By the middle-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ritualists and thinkers employed a sort of appeal to antiquity, and in combining this with the realities of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they constructed a theory which would constrain monarchical power. This to some degree eroded the monopoly held by monarchs over the “supreme position” in the spatial expression of power, and the portrayals of King Wu as “facing east” and/or “facing north” in the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Wu Wang Jianzuo* are prime exemplars thereof. At the micro-level, gradual changes in the spatial expression of ruler-subject during Zhou reveal that “space” was greatly valu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Zhou’s political order, and as such,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thodology of “spatial positioning—power relations—identity order” allows us a glimpse of the effects of “space” o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der in early China.

Keywords: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ruler faces south; *Wu Wang Jianzuo*; ruler-subject identity order in Zhou Period

责任编辑: 王轲 长亭